

# 社会统计

*Social Statistics*

熊健益·主编 陈晓卫·副主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社会统计

*Social Statistics*

熊健益·主编 陈晓卫·副主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统计 / 熊健益主编. —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037-7260-3

I. ①社… II. ①熊… III. ①社会统计 IV. ①C9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7273 号

## 社会统计

---

作 者/熊健益 陈晓卫

责任编辑/张 赏

封面设计/张 冰

出版发行/中国统计出版社

通信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甲 6 号 邮政编码/100073

电 话/邮购(010)63376909 书店(010)68783171

网 址/<http://esp.stats.gov.cn/>

印 刷/三河市利兴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mm 1/16

字 数/400 千字

印 张/24.75

版 别/2014 年 9 月第 1 版

版 次/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区以任何文字翻印、拷贝、仿制或转载。

中国统计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 前 言

在我国现阶段,有两类在内容上差异很大的社会统计学教材。第一类教材主要以社会现象背景资料为例,讲解统计学的原理与基本方法;或者说,这类教材主要讲授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统计方法。第二类是典型的应用统计学教材,其主要内容是以社会学理论、相关实质性学科理论以及一般的统计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利用社会指标体系对社会现象及社会的运行状况进行全面描述、分析与评价。第一类教材不少,是社会统计学教材体系中的主力军,很适合只学一门统计学课程的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学生选用。对于已经学过《统计学》课程的统计学类专业的学生(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来讲,显然第二类教材更适合。但是,第二类教材现在还很少,笔者从事社会统计学教学已经十余年,每次在选教材和参考书时都非常受限制。因此,本书的编写目的在于为高校统计学类的本科专业提供一种可供选用的社会统计学教材,同时也可以作为社会统计工作者、社会经济管理者们的参考书。

本书编写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的原则。(1)从内容上看,本书涵盖了社会统计学理论研究和统计工作实际的主要方面。全书共分十章:总论、环境统计、人口统计、婚姻、家庭和计划生育统计、社会劳动力资源统计、居民生活统计、社会保障统计、教育统计、卫生与文体统计、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2)从理论描述及其应用看,编写中严格遵循社会学、相关实质性学科及统计学所公认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同时也尽量吸收社会统计学研究前沿的理论成果,紧密结合我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来分析问题。(3)讲求实用,是本书编写力争突出的最主要的特点,也是本书命名为“社会统计”而非“社会统计学”的原因所在。首

先,本书考虑统计学类专业开设课程的实际情况,在内容上花了一定篇幅讲述“环境统计”,该章的编写在我国现行环境统计方法制度指导下密切结合经济社会现象实际,描述环境统计的基本理论方法与应用,因为当今环境统计的地位日益重要而统计学类的专业几乎不单独开设环境统计学。其次,本书编写中分析问题时尽量采用权威机构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选编了较多的统计公报或精彩文章作为社会统计的案例,为读者尽快了解和适应工作实际、深入学习社会统计的理论与应用架起来一座“学用”桥梁。最后,为方便读者阅读与学习,每章开始有引言,从社会生活中的例子或实际需要,引入该章要讨论与讲述的问题;每章结束部分有小结、思考与练习,有利于读者加深学习印象,提高实际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承担本书编写任务的有:熊健益(第一章、第三章)、叶祥凤(第二章)、金明(第四章)、邹永红(第五章)、彭莉莎(第六章)、丛日玉(第七章)、晏正春(第八章)、李明(第九章)、陈晓卫(第十章)。全书由熊健益担任主编,负责全书的设计、修改、总纂与定稿工作,陈晓卫担任副主编,协助主编工作。

本书写作过程中作者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出版或网络上的有关专著、教材、文章以及政府统计公报,案例中直接选用了有关文章或公报,本书作者对这些著作的作者表示敬意和由衷的感谢。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统计出版社的有关同志、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统计学院的领导和有关老师的大力支持,向他们表示感谢!在书稿校对过程中,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统计学院研究生王艳云同学做了不少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和作者水平有限,书中一定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望专家和读者朋友提出批评和宝贵意见。

熊健益

2014年3月于成都

## 前 言

<b>第一章 总论</b>	1
第一节 社会统计的产生与发展	1
第二节 社会统计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12
<b>第二章 环境统计</b>	20
第一节 地理环境统计	20
第二节 资源环境统计	29
第三节 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统计	44
<b>第三章 人口统计</b>	59
第一节 人口数据搜集	59
第二节 人口规模统计	63
第三节 人口构成统计	65
第四节 人口变动统计	83
<b>第四章 婚姻、家庭和计划生育统计</b>	119
第一节 婚姻统计	119
第二节 家庭统计	135
第三节 计划生育统计	138
<b>第五章 社会劳动力资源统计</b>	143
第一节 社会劳动力资源的概念及构成	143
第二节 社会劳动力资源统计分析	148
第三节 社会劳动力资源统计预测	181
<b>第六章 居民生活统计</b>	189
第一节 居民收入统计	189
第二节 居民消费统计	202
第三节 住户调查	218
第四节 贫困统计	223
<b>第七章 社会保障统计</b>	232
第一节 社会保障统计概述	232
第二节 社会保险统计	241

# 目 录

第三节	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与社会优抚统计	253
<b>第八章</b>	<b>教育统计</b>	263
第一节	教育发展规模统计	263
第二节	教育发展水平统计	280
第三节	教育结构统计	289
<b>第九章</b>	<b>卫生与文体统计</b>	300
第一节	卫生事业发展水平及其变动统计	300
第二节	居民健康状况统计	315
第三节	文化与体育事业统计	326
<b>第十章</b>	<b>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b>	343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含义	343
第二节	社会发展水平的量化测度方法	344
第三节	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363
第四节	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372

# 第一章

## 总 论

什么是社会统计？为什么会产生社会统计？社会统计能做什么？社会统计研究什么？本章主要通过讨论社会统计的产生发展以及社会统计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两方面的内容来回答以上问题。

### 第一节 社会统计的产生与发展

#### 一、社会的含义

对社会含义的理解及使用和社会统计学的研究范围与对象密切相关。

##### (一) 广义的基本的含义

通俗地讲，社会是相互联系的一群人组成的有机整体。但是，社会不等于群体。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密切，有一定的组织结构，有一定的分工，有大家认可的文化特征或价值观念。在社会学中，社会指的是由有一定联系、相互依存的人们组成的超乎个人的、有机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或称为社会形态，是由一定经济基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它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构成的总体。这是广义的基本的社会概念。比如，黑社会、上层社会。

##### (二) 生活中使用的含义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常常把社会的某些方面特指为社会，如“社会办学”、“社会集资”。其中的“社会”带有“政府以外”的含义。

##### (三) 狭义的特定的含义

目前使用较多的一种社会含义，是指“经济活动以外”的人类社会生活活动。通常包括科教文卫事业、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人民生活和人口数量与质量等十分广泛的内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社会正是这种含义。一般所指社会统计中“社会”就是取此种含义。

### 二、社会统计简史

从统计实践来看,中外社会统计活动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就已产生了。

在中国,大禹王于公元前 22 世纪“平水土,分九州,计民数”,其中的“计民数”是我国最早的人口调查。公元二年(西汉孝平帝元始二年)进行的全国人口调查,得出“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的总数,并详列各州郡数字。明洪武年间建立的“户帖”(按户人口登记表)和“黄帖”(人口登记汇总册)人口调查制度趋于经常化。唐代有计口受田的统计计算,宋、明代有田亩鱼鳞册土地调查制度。在西方,公元前 27 世纪,古埃及为了建造金字塔和大型农业灌溉系统,曾进行过全国人口和财产调查;公元前 15 世纪犹太人为了战争的需要对以色列进行男丁的调查,包括家室、宗族、人名等。罗马帝国于大约公元前 6 世纪为了管理国家的需要,规定每五年要进行一次人口、土地、牲畜、家奴的调查,并以财产总额作为划分贫富等级以及征税的依据。

从社会统计有关概念的使用看,其时间的出现比社会统计实践活动晚了很多。有些学者认为,较早使用者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约 1859 年)中说,“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高庆丰,《欧美统计学史》);而有人认为最早使用“社会统计”这一概念的是德国人 V. 约翰在他的著作《统计学史》中(1884 年出版)(黄德邻,《社会统计》)。较早使用“社会统计学”一词的是纳普(G. F. Knapp),1871 年他在《经济学·统计学年报》第 17 卷“文献栏”内发表的《关于凯特勒社会统计学和人类学著作的报告》一文中已经使用(高庆丰,《欧美统计学史》)。第一本社会统计学专著是 1898 年挪威人凯尔(A. N. Kiaer)和翰森(E. Hanssen)合著的《社会统计学》。

社会统计概念的内涵在不断发生变化。最早的社会统计学的概念是与数理统计学的概念相区别提出的,但是“数理统计学”的称谓却早于“社会统计学”。因为早期的统计学都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比如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因此,人们一说“统计学”立刻就知道这是一门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完全无必要在“统计学”前面加上“社会”字样。统计学的若干分支也有不同的名称,诸如政治统计、人口统计、经济统计、犯罪统计、伦理统计或道德统计等,都出现在“社会统计学”一词之前。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学”已成为约定俗成、相沿习用的词。只有当出现了“数理统计学”——特别是出现了数理统计学派之后,为了与之相区别才给原有的政治统计、人口统计、经济统计、犯罪统计、伦理统计或道德统计等分支上

加上一个概括的名称——“社会统计学”。此时的社会统计学是与数理统计学对应的概念。但是,现在所说的社会统计的含义又发生了变化,即现在所讲的社会统计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六十年代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特点是:它以补充、深化经济统计,弥补经济统计研究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的不足为使命而登上统计舞台。因而,社会统计的对象主要是区别于经济统计的。

广义的社会现象包括经济现象即所谓的社会经济现象,由于各类社会经济现象数量方面研究的深入和专门化,社会统计概念的内涵还在变化,结果使社会统计学研究范围大小呈现相对性和研究对象具有一定复杂性特点。

### 三、社会发展观的进步推动社会统计的发展

物质是第一位的,物质资料包括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过去大多数人认为,物质资料生产与消费的数量多少、质量高低决定了人们生存质量。所以长期以来经济统计受到特别的重视,而社会统计在统计学大家族中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其发展相对缓慢。但是,只重视经济发展,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了环境恶化、社会矛盾突出、人们幸福感降低等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状况迫使人们重视每个人全面发展、重视人类社会自身及其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加强对非经济的社会现象数量方面进行研究,以及为人类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决策服务的社会统计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换句话说,社会发展观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统计实践活动和科学研究的发展。

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看法叫社会发展观。比如,对社会是什么、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怎样实现社会发展的目的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根本看法是社会发展观的基本问题。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社会发展观的演变经历了两种基本类型: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和新的社会发展观。

传统的社会发展观认为,一个社会的进步,首先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聚集。只要经济增长快,就可以带来社会繁荣、人民幸福、政治稳定。传统社会发展观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发展观,它有两种思想倾向:其一是非全面性。它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加重破坏了环境的深度与广度。其二是非协调性。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只考虑眼前的功利与实用,不顾及人类发展的长远利益,忽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以为经济增长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其结果却是眼前经济增长越多,对环境与资源、对他人与后人的破坏可能就越大。在这种社会发展观指导下,社会发展目标集中在经济的持久、高速增长上。生产规模和能力,生活富裕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社会发展计划就是国民经济计划。统计中相应表现为建立起衡量经济增长规模、速度、水

平、结构等的一系列指标。从国家到地方，直至企业，都广泛使用各种经济指标，作为计划、考核、评比的尺度。

推崇纯粹经济增长的传统社会的发展观指导下，各种环境与社会问题不断加剧，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意味着社会发展和进步，物质财富的增加也不一定会给社会成员带来幸福，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关于究竟什么是“发展”的再认识。

新的社会的发展观或称之为科学的发展观，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的发展观，是在传统的发展观创新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以整体性作为社会的发展观的出发点，在发展中考虑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别是人类的长远利益，在发展的内容上强调综合性与协调性，认为社会的发展最终体现在人的发展上，人的素质、生活质量、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和参与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内容。为此，必须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应当把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系统作为整个社会的发展统一大系统中的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优化处理。不应当追求某些指标的最多、最快，而应当从社会整体效益中选择这些指标的最优、最好。与此相适应，必须强化监测经济以外社会的发展状况和社会问题的能力，加速改进和完善经济指标以外的统计、监测、登记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而这些正是社会统计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所以，社会的发展观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统计学的发展。

### 阅读资料：人类社会的发展观的历史演进<sup>①</sup>

鲁东大学马文军、房旭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观的历史演进与科学的发展观两个简化指标的构建》一文中对社会的发展观的核心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观经历的历史阶段有精彩的分析与描述。该文作者认为，社会的发展观中最核心的问题有三个，分别是社会根本属性、社会的发展核心、社会的发展模式。社会根本属性就是社会属于谁所有，社会的发展核心就是社会主要发展什么或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的发展模式就是如何发展以实现其所认为的社会的发展主要任务。社会根本属性和社会的发展核心主要是一种理念认识，而社会的发展模式则是如何将社会根本属性和社会的发展核心方面的理念认识付诸实践并最终实现，其实质是如何根据社会根本属性和社会的发展核心方面的理念构建相应的社会治理体系，并运行之以实现其理念中的社会的发展核心任务。根据对这三个根本性问题的回答不同，人类社会的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了三种基本形态：奴隶和封建时代的“以王为本特权维护型社会的发展观”、大危机之前资本主义的“以物为本经济增长型社会的发展观”、当今时代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型社会的发展观”。

<sup>①</sup>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http://www.paper.edu.cn>

以下是文章中对三个阶段的社会发展观的描述与分析。

### 一、三种类型的社会发展观

#### (一) 奴隶和封建时代的“以王为本特权维护型”社会发展观

“以王为本特权维护型社会发展观”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种社会发展观，其存在的时代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在古代中国的表现最为典型，下面就以古代中国为例分析其内容。

在社会根本属性问题上，该社会发展观的观点是“君权神授、天下王有”。《史记·殷本记》记载：商代先祖叫契，契的母亲简狄洗澡时看见燕子下了个蛋，吃后便怀孕生契，开商之先河，称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周本记》记载，周代先祖叫后稷，后稷之母姜嫄外出踩巨人脚印行走而怀孕生后稷，开周代之先河。这些君王出身的记载，反映出当时社会“君王为上天化身”和“君王统治天下的权力具有当然的合法性”的认识，其核心思想显然可以归结为“君权神授”。后来的君王不可能再通过神话传说将出身与天连接起来，却将“君权神授”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自西周成王始，君王的称呼改为天子，意指君王是天之子，其权力由天授予。在“天下王有”方面，《诗经·北山》明确提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指所有天下的土地物产和万民百姓都归君王所有，都是君王的臣子。此后的先秦诸子中除极个别对这种思想略有怀疑外，多数都进一步阐述发展了这一思想。法家《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国者，君之车也”，《管子·形势解》说，“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都非常直截了当。儒家讲得比较含蓄，视君主为民之父母，从外观上看十分温情，然而在当时父母对儿女是一种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荀子更是爽快地宣布“贵可天子，富有天下”。这种有利于君王的“君权神授、天下王有”思想理所当然的被君王全盘接受，商代君王自称为“余一人”，西周成王后君王改称天子，秦始皇后君王统称皇帝，即是为证。此期间虽有《孟子·尽心下》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不同思想出现，但难以撼动“君权神授、天下王有”的主流思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君权神授、天下王有”思想一旦社会化，被社会接受，它就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实和毋庸置疑的前提，深深植根于百姓的心里，一直贯穿了于整个奴隶和封建社会。

在社会发展核心问题上，该社会发展观基于“君权神授、天下王有”理念，将社会发展的核心理所当然地定位于了维护君王的天下大业。《尚书·君奭》中有一段记载：“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媿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详。”意思是说：殷做了许多坏事，天降丧于殷。我周受了大命，但不敢说我们事业永远美好，即使有上天帮助，我们也应该尽心尽责维护来之不易的天下大业，避免商一样被推翻的命运。维护君王的天下大业就是社会发展核心目标的理念在这里表现的一览无余。《尚书·无逸》还指出，为了

维护自己的天下大业,君王应“无淫于观,于逸,于田”,即不能过度地寻欢作乐、贪图安逸和四处游玩打猎。社会发展的核心就是维护君王天下大业的理想,在以后各个朝代都得到了明确体现,成为历代君王及其构建的社会治理体系运行的核心理念。《贞观政要·君道》关于贞观十年李世民与臣下的一段对话记载即是明证。“太宗谓侍臣曰:‘君王之业,草创与守业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天下)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偿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不过在现实中,君王由于创业之后便处于社会顶层而缺乏有效监督,其守业的目标往往会转变成如何能在维护自己天下大业不失的前提下享受社会顶层的绝对特权。

在社会发展模式中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问题上,不同时代思想家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均认为应该根据“君权神授、天下王有”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就是维护君王天下大业的理想,构建一种以“君王拥有绝对权力”为本质特征的社会治理体系。《管子·七臣七主》说“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商君书·修权》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儒家孔子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代表君王权势的器与名“不可假人”,《墨子·尚同中》则认为“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即是为证。在如何运行这个社会治理体系方面,古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观认为应该同时采取“王”道和“霸道”这两种相辅相成的方式,实现维护君王天下大业的理想。所谓“王”道,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要建立一套用来感化和教育天下百姓并使其自觉自愿地服从君王绝对权力的道德体系,以维护君王的天下大业。长期处于封建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实际上充当了这种角色,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思想,孟子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思想,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等三纲五常思想,其核心内容实际上都是在教育和感化天下百姓要向君王绝对忠诚。所谓“霸道”,就是通过法律、军队等国家机器暴力的行使,强迫怀疑和挑战君王绝对权力者服从君王的绝对权力,维护君王的天下大业。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实际上充当了这种角色,韩非子认为,天下是君王私有之物,君王应运用法、术、势来维护自己的天下大业。“势”是指君王手中的权力权威。“法”用《韩非子·难三》中的话讲就是“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是指办事和用人的方法和艺术,也就是政治手腕。韩非子认为,君王首先应立法,并公布天下,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法一经公布,君王就必须明察百姓的行为,并运用其拥有的势,奖赏守法的人,惩罚违法的人,实现其对天下百姓的统治和维护自己的天下大业。该社会发展观在社会发展模式方面的理想认识,基本上被中国历代君王所采纳,并基本上实现了维

护自己天下大业的任务目标。

## (二)大危机之前资本主义的“以物为本经济增长型社会发展观”

“以物为本经济增长型社会发展观”的存在时代为从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在资本主义早期的主流国家英、法、德、美表现最为典型,下面就以这些国家为例分析其内容。

在社会根本属性问题上,该社会发展观的理念与以王为本特权维护型社会发展观截然不同,提出了“天赋人权、天下为公”的观点。14世纪和18世纪,欧洲先后爆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这两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旗帜鲜明地提倡人权,反对神权,肯定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批判禁欲主义;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反对封建特权,不以出身门第为贵,主张以德才取人;强调个性解放,追求财富、荣誉与幸福;崇尚科学和理智,追求真理,要求全面发展人的才智等。其中“天赋人权、天下为公”的民主思想是核心内容之一。所谓“天赋人权”,用卢梭的话讲就是“人生而自由平等”,社会中的公民人人都有享受自由、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影响国家政策的平等机会和权力。“天下为公”是孙中山提出的一个口号,西方国家多称为“主权在民”,其意思用卢梭的话讲就是国家和社会是“由全体个人的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只能建立在自由人的“社会契约”之上,社会契约赋予了国家权力,国家代表着“普通利益”和“公共意志”,其主权的享有者应该是人民,而不是什么君主和神灵。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宗教神学展开的全方位和多侧面的猛烈进攻,使得“天赋人权、天下为公”的民主思想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广泛接受,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思想,被贯彻到了西方各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如美国建国的纲领性文件《独立宣言》就明确宣称:“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国的《人权宣言》也明确宣称:“全部主权的源泉和根本,存在于国民之中”等等。

在社会发展核心问题上,该社会发展观认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就是经济增长。从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人类社会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只是相对于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奴隶和封建时代而言的,相对于这个时代中人们随着“天赋人权、天下为公”思想解放而释放出的对物质经济的巨大而旺盛的需求而言,相对于20世纪下半期以后更为先进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言,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非常低下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确立时这种状况表现的尤其明显。所以,如何优化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满足社会对物质经济产品的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成为这个时期的核心要务,结果社会发展的核心被理所当然地定义为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核心就是经济增长的观点,在经济学开山鼻祖斯密和科学管理之父泰罗以及这个时代的其他主

流经济和管理学家如李嘉图、马歇尔、熊彼特等人的论著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管理学家们从个体人的微观角度着眼,提出了“经济人”的观点,认为人一切活动和行为的动机均出自个人的经济利益,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经济学家们则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着眼,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就是促进国民财富的持续性增长,社会发展就是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过程,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标志就表现为其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上。社会发展的核心就是经济增长的观点提出后,迅速为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采纳,用于指导自己国家社会发展的实践,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长期被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衡量社会发展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中的国民(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内)生产总值等核心指标均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测度的。

在社会发展模式问题上,该社会发展观认为应根据“天赋人权、天下为公”和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核心理念,相应构建一套不同于以前体系的全新的社会治理体系。尽管由于各国的历史环境不同导致在这种全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具体构建方式上有议会制、总统制、委员会制等不同类型区别,但对要构建的这种全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本质特点还是相同的,即国家最高权力拥有者应由选举产生而不是世袭产生,应拥有相对的权力而非绝对的权力,必须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和法律责任,必须向社会大众负责。在如何通过这种全新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经济增长这个核心目标方面,该社会发展观的基本认识是:社会中的人是完全理性的,其经济信息是完全的,市场价格是可以根据供需变化而自由迅速升降的,不需任何调节干预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利用,自由放任而不予任何干涉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因此,“政府是必要的祸害”、“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基于这种认识,该社会发展观认为,这种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在实现经济增长这个核心目标过程中的最佳定位应该是“守夜人”,最佳策略应该是“无为而治”。

### (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型社会发展观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型社会发展观”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各国在对以物为本经济增长型社会发展观不断批判和修正中逐步提出完善的。在社会根本属性问题上,该社会发展观的认识与以物为本经济增长型社会发展观相同,仍然继续了“天赋人权、天下为公”的理念,但在社会发展的核心和社会发展的模式方面,有了根本性进步。

在社会发展核心问题上,该社会发展观在不断修正和深化关于人本性和人需求理论的基础上,最终提出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20世纪30年代,行为管理学派的“社会人”假设取代了“经济人”假设,成为当时社会关于人性看法中的主流观点,该观点认为,人是社会人,人不只为追求经济利益

而生存的,还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社会和心理欲望的满足,因此社会发展除了经济增长外,还应包括社会人之间的协和等。20世纪50年代,社会关于人性的看法中又出现了“复杂人”的假设,认为人是复杂的,人与人的差别不仅因人而异,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年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行为动机和需求,因此社会发展的核心就应随着人的不同需求而不同。20世纪90年代,福利经济学在当代的最重要代表人物、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蒂亚·森明确提出了一种“以人本为中心”的全新的自由发展观,其指出,以前的狭隘的发展观认为社会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这些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固然很重要,但最终来说,它们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福利,因此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最根本衡量标准,应该是基于人本原则而非物本原则的人自我需要的满足和自我发展的实现。阿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提出后,引起了广泛共鸣,标志着社会发展观的哲学前提正式实现了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质的转变。2003年11月和2004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身改革开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吸取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型发展观,被称作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就社会发展的核心而言有二,一是人的全面发展,二是社会全面进步,因此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型社会发展观”的最高层次。

在社会发展模式中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问题上,该社会发展观与以物为本经济增长型社会发展观相比没有质的区别,但在如何运行这个社会治理体系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个核心目标方面,实现了四次修正和进步。(1)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发生,使人们认识到“不需任何调节干预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利用”的观念是错误的,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无为而治”的自由放任治理模式受到冲击,凯恩斯关于加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以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宏观经济学说被接受,与此相应,社会治理体系逐渐摆脱了“守夜人”的消极角色,开始大规模扩张经济职能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2)70年代以来,各国逐渐认识到,虽然工业革命的发生使人类社会的总财富成千上万倍地增长,但两极分化严重,就业、教育等社会问题繁多,由此开始关注产出的物质经济成果在社会内部如何合理分配和社会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并逐步提出和实行了以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的发展计划。比如联合国战后的第二个十年发展计划(1970~1980)明显改变了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1960~1970)单纯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为指标的提法,提出了财富分配、社会公平、社会就业、教育、科学、文化、环境以及地区间的协调等目标要求。迄今为止已有数十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建立推行了各自的社会发展评估指标体



系。(3)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对立成为全球性的严重问题,人类不得不对只关注物质经济产出而忽视所付出的资源生态环境代价的现实进行深刻反思,考虑如何用最少的资源生态环境代价来产出和获取最大的物质经济成果。1987年,以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表了《我们的共同未来》,正式系统完整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体系,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响应。目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了许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范式。(4)随着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阿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提出,尤其是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被提上日程,这种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有三:一是要求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要求实现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三是要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发展。不过相应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和公共管理指标体系还有待确立。

## 二、三种基本类型社会发展观的比较

“以王为本特权维护型社会发展观”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确保了人类社会发​​展前进所必须的秩序和稳定,正是在这种社会发展观的指引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还是取得了缓慢但明显的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社会发展观是有其存在的历史意义的。但这种社会发展观的缺陷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明显的:在社会根本属性问题上认为天下属于君王私人所有,与其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发展观“天赋人权、天下为公”的观点相比显然是落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代,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还非常低下,社会经济发展应该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但这种社会发展观却回避了这个第一位重要的事情,而将社会发展的核心理所当然的定位于了维护君王私人的天下大业方面,受其影响,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对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科技创新和经济改革往往缺乏足够而持久的兴趣,经济发展被有意无意地放到了可重视可不重视的第二位置,社会各界的主要注意力被吸引到了在维护君王天下大业和绝对权力的过程中获得不同层次特权的轨道上来,而这正是古代经济发展缓慢和封建制度长期延存的主要原因所在。

“以物为本经济增长型社会发展观”与以王为本特权维护型社会发展观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首先,以“天赋人权、天下为公”的先进观念取代了“君权神授、天下王有”的落后观念,对社会属性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其次,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核心内容,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甚至就是保证人类生存延续的第一要义,该发展观紧紧把握住了经济发展这个核心,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正是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得到了飞速发展,其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社会财富,比之前人类创